

高等教育改革:组织变革的视角

——读《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李立峰

摘要:由伯顿·R·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是一部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名著。他从组织的观点对高等教育这一学术组织的特点、变革方式和协调机制等做了独到的分析。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从组织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新视野,也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高等教育;组织;变革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0627(2004)05 - 0033 - 04

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名学者伯顿·R·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是一部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经典名著。作者从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组织的、文化的观点等八个视角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阐述,使我们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中,克拉克从组织的观点对高等教育这一学术组织的特点、变革方式和协调机制等做了独到的分析。“从组织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系统可以成为公正客观地评价该系统的一种方式”,^[1]同时也对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观点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帮助和借鉴。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从组织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新视野,也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起到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伯顿·克拉克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分析

1、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观点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生产知识的群体构成的学术组织,以高深知识为核心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特征。“知识是包含在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共同要素;科研创造它;学术组织保存、提炼和完善它;教学和服务传播它。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处理各门高深学问就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并一直是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领域。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这种一门门的知识称作‘学科’,而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2]所以,高深知识和学问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克拉克还进一步指出了高深知识的若干特点及其对学术组织的影响:第一,高深知识具有专门化的性质,很久以来就由若干专业组成。任何其他组织都不像大学和学院群体拥有如此广泛的知识领土。第二,高深知识的自主性程度越来越高,专业与专业之间,专业与中小学所传授的普通知识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知识领域表现出内在深奥性和固有自主性,从而导致作为组织的大学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第三,发现知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每个专业都要跨越自己的专业界限,进入目前尚未标界的领域才能不断前进;第四,知识是世代代积累起来的。各门学科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随时间迁移而发展,并获得不同的声誉。^[3]

2、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总体矩阵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内围绕学科组织的第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作的结构。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可以从四个不同的横断面和纵断面来对其人员进行划分。这四个断面是:在各高校之间,横的划分称部门,纵的划分称等级;在高校内部,横的划分称组合部

收稿日期:2004 - 04 - 13

作者简介:李立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门,纵的划分称层次。高等学校的种种活动都是学者围绕学科、大学和学院等学术组织来进行的。学科既是高深知识的专门领域,也是学者安身立命的事业单位。他认为,学科和院校两种组织模式相互交叉,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矩阵,总体矩阵是工作划分的基础方式,大学教师既归属于一门学科,又归属一所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学者两条成员资格线的交叉就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矩阵,高等教育的特点就表现在这里,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具有同样范围和强度的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4]但是,高等教育的矩阵并非到处都是一样,研究型大学更重视专业和学术成就,具有学科中心和教授主导的特征,社区学院则重视教学,排斥研究。由于学科和事业单位在大学的基层单位汇合,“各学科和各院校以一种更为复杂的组织方式相互交错,因此,要对矩阵组织进行分析,就是要对现代高等教育中那些令人困惑的复杂结构的结合点进行剖析。”^[5]

3、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运动中的矩阵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变革是运动中的矩阵,其运动趋势源于工作、信念和权力结构,源于围绕学科和院校形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总体矩阵和各种协调方式。克拉克指出,变革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基层变革,是一种在以基层为主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中,通过自我推动或内部引导的方式进行的变革。基层变革是一种关键的变革方式;第二,通过劝说进行的革新,由上层机构发起,通过与下层利益集团的合作来推行,因此,上层任务必须与地位同等的人协商,以贯彻他们的意旨或命令;第三,渐进的变革,由于高教系统的任务和权力相当分散,因此全面的变革很难进行。更为有效的变革是从无计划的行动中产生的点点滴滴的变革,渐进的适应是变革的普遍形式;第四,边界渗透的变革,总体矩阵确保边界角色分散在各大学或学院的不同基层单位,这些边界角色可能与一个更大系统内外的同类角色建立联系,变革是静悄悄地渗透院界的边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发生;第五,无形的变革,知识作为一种材料和产品具有不可见性,这是认识学术系统内发生的变化最大困难,因此,发展思想(如研究中)、传播思想(如教学中)、吸收思想(如学习中),都很难直接在它们发生时看见并做出评价。^[6]

二、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分析对我们的启示

伯顿·克拉克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分析和系统把握不仅对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一开始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这种以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研究,其优势不言自明。但同时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学科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研究视角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关照不够等等。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偏差也就导致了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的许多不遵循高等教育内部逻辑的问题。所以,从系统论和组织的角度来深刻理解和把握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特征、协调机制和变革方式等,对我国建立功能完善、系统分化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1、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启示 克拉克认为:“那些用全面综合的形式阐述目的或概括高等教育特点的人,是典型地、重复地从错误的端点出发的人。他们从系统的顶端开始,而高等教育中最佳的端点是基层。”^[7]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学术组织,其逻辑起点是高深知识,围绕高深知识建立起来的学科和专业是这一学术组织的基层单位,而要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要素及其要素的整合、变革和规范,也要从这一最基层的单位入手。因此,离开了知识和学术活动这一基础,高等学校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特殊价值。为此,我们在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时,必须从其内部出发,以学科和专业为研究取向,并自内向外弄清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种种关系。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宏观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居多,微观的、院校研究以及围绕各学科展开的基础研究还非常欠缺。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很容易抹杀高等教育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不能有效地按照高等教育的内部规律来进行学术管理。所以,对我们来说,研究视角的转变非常必要。遵照学科的内在发展规律,科学把握学术组织的本质特征,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来进行高等教育研究,对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有效性和管理的科学化,都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宏观的自上而下的研究取向的价值,只不过这种研究取向存在局限性,也有个适用性的问题。因此,高等教育系统的研究视角应

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机统一,但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则尤为必要。

2、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克拉克认为,高教系统的变革是源于在高教系统中根深蒂固的工作、信念和权力结构,围绕学院和学科,运用各种科层的、政治的、专门的和市场的协调手段来进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他用“运动的矩阵”来分析和描述高等教育系统的变革方式,这对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有很大的启示。高等教育作为以知识和学科为起点的学术组织,其改革与经济、政治、社会等组织类型的改革有很大差异,也有着更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也是其自身结构和外部要求相互作用,遗传适应和制度创新辩证统一的产物,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互交织的矛盾运动过程。

首先,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方向更多的应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用组织的观点来说,高等学校是一种“底部沉重”的组织结构,也就是说,在基层的学科和专业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学术事务和学术权力,学院和大学只不过是众多学科专业进行松散联合的组织。如果改革是合乎规律的行为,那么改革的着眼点应更多地放在基层的学术组织,如学系或学院。先从高等教育系统来看,尽管管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中央高度集权的惯性依然强大,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管理模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如合并和扩招等,就其实质,还大多是“政府行为”,高校特别是基层学术组织的利益和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还没有真正落实,学术自决的权力也还与应然状态相去甚远。所以,遵照学术自由的原则,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依然是一项艰巨的改革任务,任重而道远。再从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来看,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需求往往被院校一级的管理者所左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依然纠葛不清,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妨碍了学科专业的自由发展;科层体制日益蔓延扩张,绩效管理到处盛行。为此,我们必须把握学术组织的本质特征,将改革路径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满足基层的利益诉求,遵照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来积极地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

其次,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形式应是渐进的、稳妥的,而不是疾风暴雨式的激进变革。我国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在制订高等教育政策时采用积极的赶超战略无疑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但是改革必须建立在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必须是高校内各学科和专业可以承受的区间之内。否则,这种只靠中央法令推行的系统的激进改革很难成功。建国之初,特别是大跃进时期,高等教育曾经脱离经济基础,实行盲目急躁的“跨越式”发展,结果是使高等教育元气大伤,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我国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急躁冒进的倾向,有学者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幅度已经超过了合理的波动区间,^[7]对于这种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因此,我们应当调整思路,用渐进的适应来代替激进的变革,正所谓“急进则多阻力,渐进则易收功”。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功能尚未健全的且又异常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来说,其惰性之大,不言而喻,面对剧烈的变革,更是缺乏灵活反映的能力。

再次,由于知识材料的特殊性,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还会存在许多隐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渗透学科和院校边界,以潜在的方式悄然进行的,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变迁”,这也是文化组织不同与其他组织类型变革的特殊方式。在我国的改革实践中,隐性变革的重要性很少引起管理部门的重视,但正是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东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学术及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对我国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有重要启示。虽然政府的大力资助、政策的适当倾斜对建设一流大学非常必要,但是一流学科、一流专业的形成不是依靠这些外部的经济刺激和人为的干预一蹴而就的,在很多时候是在学科知识的点滴积累、学科建设的日益完善,是在不动声色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一流大学不是“建设”成的,而是源于学科知识内在生长的需求,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和谐互动中渐渐形成的。

虽然我国的文化背景、教育传统和制度架构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在社会转型时期高等教育的改革也要面临更为繁杂的任务,但克拉克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特别是用组织变革的角度对高

等教育系统的分析对我们不无借鉴和启示。

高等教育的变革是遗传适应和制度创新相互统一的产物,因此在改革中也要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西方有位学者指出: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大学在传统和变革之间表现出诡秘异常、难以捉摸,是由大学这一学术组织的本质特征决定的。玛格丽特·阿切尔指出:“一旦一种既定形态的教育得以存在,它就会对未来教育的变革产生影响。”^[8]显而易见,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在大学组织中体现尤为明显。我们必须重视外部社会的剧变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同时更要珍视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传统。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构未来,只有在以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所以,面对改革,我们“必须在社会需要和大学传统之间寻求一条恰当的途径,在变化了的外界环境和高等教育的结构、功能之间寻找一种耦合机制。惟其如此,高等教育系统的改革才能富有建设性,才能导致新的稳定有序结构的出现。”^[9]

参考文献:

- [1]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05.
- [2]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3-15.
- [3]杨春梅.学术组织视野中的高等教育系统——伯顿·R·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观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02,(4).
- [4]陈廷柱.高等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J].高等教育研究,2000,(5).
- [5]徐力.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文化浅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3).
- [6]李猛.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J].读书,2004,(1).

(责任编辑 徐鸿钧)

(上接第 32 页)

- [13]梅贻琦.对战后清华发展之理想[A].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32.
- [14]李登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N].复旦周刊,(24),1929-11-04.
- [15]潘光旦.论教育的更新[J].新路,1948,1(10):7.17.
- [16]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67.
- [17]王运来.略论郭秉文的大学教育思想及其启示[Z].(未刊稿,1999)
- [18]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N].独立评论第十四号,1932.8.28.
- [19]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蔡元培全集(第五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13.
- [20]陈岱孙.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和前校长梅贻琦[A].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Z].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 赵蔚)